

# 回眸中国出版业（六）

马敏 主编



# 目 录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 .....	1
中国期刊业的青春时代 .....	13
几种不同类型的期刊 .....	39
书刊业的改革 .....	55
外文书刊的出版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	59
外文图书的出版 .....	61
外文期刊的出版 .....	78
外文书刊在国外的影响 .....	87
中国图书出版的国际交流 .....	95
中国对外合作出版 .....	108
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	118
书刊的编辑工作 .....	123

##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

期刊是出版物的主要形式之一。当代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是当代中国整个出版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书籍和期刊都是知识的载体，都有积累精神文化成果，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如果说，书籍总结的成果、传播的知识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统些，那么，期刊凭借它出版周期短和定时的特点，传播成果和信息的速度就显得快捷，时效性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个变革时期，一批先进分子以创办期刊来宣传先进的和革命的思想，唤起人民的觉醒，推动社会的变革。可见期刊的效用是很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期刊出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期刊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到一九九一年八月，中国大陆正式登记出版的期刊共 6005 种。它们门类齐全，发行量大（如《半月谈》每期发行 525 万册，《求是》每期发行 280 多万册，《读者文摘》每期发行 190 万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传播信息、丰富人民生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现代涵义的期刊。从戊戌维新运动，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是中国期刊的勃兴和发展时期，但时有起落。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随着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期刊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禁锢言论，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因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期刊出版事业不

断遭到摧残；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出版的期刊仍然不多，门类也不全，主要是文学和时事政治、教育、财经等类期刊。文学期刊绝大多数是被称为“零食”的“软性刊物”，其中一大批格调低下、庸俗甚至淫秽。时事政治、教育、财经等类刊物的读者对象，基本上是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各种期刊的发行量都不大，一般只有几千份。从十九世纪维新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基本上是中国出版事业的中心，全国的期刊编辑出版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此外是以南京、北平、广州等地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南部沿海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分布不平衡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全国各地大都创办了期刊，品种日渐繁多，读者对象广泛，发行量上升。然而，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也经历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像滔滔大江一样，既流经狭窄的峡谷，也流经坦荡的平原，然后汇成洪流，奔腾入海。

在中国最早出现现代涵义的期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办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创刊于马来亚的马六甲，发行到中国境内。刊物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按照现代译法，就是《中国月刊》。这是一份传教刊物，每月一期，每期5页，约2000余字。中国境内创办最早的一份中文期刊是一八三三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 üzlaff)在广州主持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主要刊登宗教、政治、科学和商业等方面的文章。一八五四年美华书馆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半月刊)和一八五七年墨海书馆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月

刊),都是由教会书馆在中国出版的早期期刊,创办者都是英籍、美籍人。在往后的数十年中,外国人又先后创办了《中外杂志》(一八六二年,在上海)、《中外新闻七日报》(一八六五年,在广州)、《中国教会新报》(一八六八年,在上海,一八七四年改名《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一八七二年,在北京,后改名《格致汇编》)等。这些刊物大多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关,各有他们的目的和打算,但在客观上也为后来中国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

### 一、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

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是期刊出版事业勃兴的一个时期。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宣传变法,“鼓动人心”,“开发民智”,介绍“新学”,先后创办了一批杂志,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后来人们借办期刊来发表各种意见的先驱。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旬刊)、康广仁等办的《知新报》(初为五日刊,后为旬刊),在戊戌变法前都很有影响。当时的期刊大多以“报”为名,有人认为这是由古代“邸报”、“朝报”、“京报”等名目沿袭而来。例如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所创办的旬刊《清议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和《清议报》停刊之后梁启超所办的半月刊《新民丛报》(一九〇二年二月)、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旬刊《外交报》(一九〇二年一月)等,也都以“报”为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以译载欧美和日本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主,有的也兼及自然科学著作的杂志。如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创刊的周刊《译书公会报》据阿英(钱杏)在其《初期的翻译杂志》一文中说,“此当是中国

翻译杂志之最早者”。稍后，有《译书汇编》(一九〇一年创刊，月刊)，其编排已完全依照杂志方式，还有由翻译家林纾监译的《译林》(一九〇一年在杭州创刊，月刊)，由励学译社编辑的《励学译编》(一九〇一年在苏州创刊，月刊)，以及内容分学术、教育、军事、内政、外交、新闻、小说等 12 门类的综合性刊物《游学译编》(一九〇二年在日本东京创刊，湖南游学生编，月刊，后改名《政法学报》)，阿英说它“为翻译杂志中之较进步刊物。其中坚分子，似为……湘人杨度”。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亦名《新小说报》，月刊，次年改在上海发行)，小说家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都发表在这份刊物上。一九〇三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创办《绣像小说》(半月刊)，请李伯元主编，李所著《文明小史》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蘧园的《负曝闲谈》均发表于此刊。这两份杂志是中国人编的最早的文学期刊，它们与稍后时期在上海创刊的《月月小说》(一九〇六年创刊，吴趼人等主编，月刊)、《小说林》(一九〇七年创刊，黄摩西主编，月刊)等，一起形成和反映了晚清文艺刊物和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一九〇一年在上海创刊、由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自一九〇二年《启蒙画报》在北京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宣传教育为宗旨的画报，如《时事画报》(一九〇五年)、《图画新闻》(一九〇七年)、《醒世画报》(一九〇九年)等。由科学家杜亚泉于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志》，主要“辑录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是中国科学期刊的先驱，它与一九〇三年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的《科学世界》，都显示出中国期刊出版事业已注意开拓自然科

学的专业领域。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月刊，一年后改为半月刊），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终刊，是新中国成立前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数十年中，在文化界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各种期刊如雨后春笋，达几百种之多。孙中山等发起组织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五年在日本东京创办《民报》（月刊），宣传三民主义，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也向国内发行，曾经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国内有识之士也创办了一批期刊，如《浙江潮》（一九一三年在日本东京创刊，孙翼中、蒋智由等主编，月刊）、《广益丛报》（一九一三年在重庆创刊，朱蕴章等创办，旬刊）、《觉民》（一九一三年由高旭、高燮等在江苏金山创办，月刊）等，都有明显的革命倾向。

《女报》（陈撷芬于一八九九年创办于上海，旋停刊，一九一二年复刊，翌年更名为《女学报》）、《女子世界》（丁初我在一九一四年创办于上海，月刊）、《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在一九一七年创办于东京，月刊）等，则是中国最早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的妇女杂志。秋瑾于一九一七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女报》，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它号召妇女团结，提倡女权、女学和鼓吹革命救国的编刊宗旨，是十分明确和颇有影响的。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峰。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的思想界注入新的血液。反映在期刊出版上，出现了一批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五四”运动前后，也是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月刊，一九一五年九

月十五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主编。同年九月出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迁北京出版。一九二二年夏，陈独秀赴沪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杂志又迁回上海，成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改为季刊。后又改为不定期期刊。一九二六年七月终刊。

《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期的“德先生”（指 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先生”（指 Science，即科学），实际上都已包括在这六项希望之中。以后又提倡文学革命。民主、科学、文学革命，这是《新青年》高举的三面大旗。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新青年》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阵地，如一九一九年五月，由李大钊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第六卷第五期）。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还有李大钊等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4开一张，周刊）；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俞秀松一九一九年在浙江杭州主编《双十》，后改名为《浙江新潮》；瞿秋白等于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创办的《新社会》；周恩来等于一九二二年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等。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此以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二二年间先后创办了《共产党》、《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向导》

周报，由蔡和森主编，它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广州创刊的《前锋》（月刊），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创办《先驱》，后又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办了它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创办的通俗刊物《平民之友》。《中国青年》由恽代英长期担任主编，萧楚女、张太雷等先后参加编辑工作，在北伐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的发行量高达3万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各地共产党组织也创办了一批刊物。

《新青年》吹响了向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进军的号角，“德先生”、“赛先生”的名字响遍全国。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一批期刊；“五四”运动前后很有影响的杂志《新潮》，就是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等在蔡元培校长和陈独秀等教师支持下，并受《新青年》影响，于一九一九年创办的刊物。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也是“五四”运动时期有影响的刊物。

“五四”新文化的汹涌浪潮也推动了一些老刊物的革新。例如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就把他们的几个刊物的主编易人，或者充实新生力量。一九二一年，茅盾革新《小说月报》，使它从鸳鸯蝴蝶派的实际掌握中解脱出来，成为建设新文学的大型文艺刊物。在此之前，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出版了不少刊物，如《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大观》、《礼拜六》等，发表了大量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茅盾革新《小说月报》，对鸳鸯蝴蝶派的网罗冲破了缺口。另外，杨贤江参加《学生杂志》编辑工作后，使这份原来是地道的课艺读物成为指导青年的革命刊物，章锡琛也被提升为《妇女杂志》的主编。

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对抗新文化运动、鼓吹守旧复古的刊物，突出的如一九二二年一月吴宓等创办于南京的《学衡》月刊，章士钊于一九二五年复刊的《甲寅》周刊。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郭沫若、郁达夫等创办了《创造》季刊，这是建设新文学的一个大型刊物。同年五月七日创刊的《努力周报》是胡适在他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办的一个综合性刊物，它宣传“好政府主义”、“联省自治”等主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后来鲁迅、柔石均一度担任主编的《语丝》周刊，提倡“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昏浊停滞的空气”（《发刊辞》）。同年十二月创办的《现代评论》，由陈西滢、徐志摩等编辑，主要刊登政论、时评，也发表文学作品和评论。一九二一年五月创刊的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原名《文学旬刊》），先后由郑振铎、谢六逸、叶圣陶等主编，作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出版，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为《文学周报》，独立发行，在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同时，与复古派等展开过论战。

## 二、从北伐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前的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当时南方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由国民党主办、共产党人主要负责编辑工作的农民刊物，如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创刊的《中国农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这份刊物探索农民运动的理论，报道各地农民运动的工作等。此外，还有《农民运动》（广州）及《湖北农民》、《江西农民》、《山东农民》等。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期刊。

北伐战争前后，随着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也出现大批军队刊物，出版地点主要在广州，主要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组织）主办的《中国军人》、《青年军人》、《兵友必读》等。

大革命时期也是旧中国期刊出版数量较多的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进步的期刊被国民党政府封禁，期刊数量因而减少。一九二七年以后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全国期刊数量又重新增长，一九三四年甚至被称为“杂志年”。据一九三六年上海《申报年鉴》统计，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底，全国共有期刊 1518 种。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新创刊的文艺期刊有《未名》、《太阳月刊》、《奔流》、《大众文艺》、《萌芽》及新月派出版的《新月》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上海左翼作家编辑出版了《前哨》（第 2 期起改名《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译文》等刊物；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编辑出版《新思想》、《社会科学战线》、《书报评论》、《研究》、《社会现象》等刊物；八月一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出版过《戏剧新闻》、《艺术信号》、《艺术新闻》等刊物，对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戏剧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文艺界、文化界人士创办了《涛声》、《论语》、《现代》、《太白》、《宇宙风》、《作家》、《文季月刊》、《光明》、《中流》、《开明》、《世界文化》、《西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读书生活》、《国讯》等刊物。这个时期以上海出版的期刊最多，其次是北平和南京等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和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等，在动员全国同胞奋起抗日救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生活》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原是由黄炎培主持的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内容以传播职业教育信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等社会问题为主。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该社编译股股长邹韬奋接任主编。“九一八”事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违反民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规定对出版物实行原稿检查，以钳制舆论。《生活》周刊不为所屈，积极宣传抗日，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拥护，销售量近20万份，创当时定期刊物销行数量的新记录。但由于触犯了国民党，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查封。一九三四年二月，生活书店出版《新生》周刊。它坚持《生活》周刊的立场，继续宣传抗日，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迫使国民党政府予以封禁，主编杜重远并被判刑十四个月。这就是中国期刊史上震惊国内外的“新生事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邹韬奋刚从海外回国，立刻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一九三六年二月又被查封，邹韬奋流亡香港。三月七日，生活书店出版由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同年六月也被迫停刊。一九三七年五月，生活书店又出版《国民》周刊，由谢六逸主编，继续宣传抗日，至同年十一月因日本侵占上海而停刊。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一批大

学内迁，以及文化人的流动，汉口、桂林、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以及香港等地，先后成为抗日文化工作的中心，出版了一批期刊。如在重庆出版的有《全民抗战》（原在武汉）、《抗战文艺》（原在武汉）、《文艺阵地》（原在广州）、《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中山文化》、《民主与科学》、《中苏文化》、《文汇报》、《现代妇女》、《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学生杂志》等；在成都出版的有《大学月刊》、《开明少年》等；在昆明出版的有《民主周刊》、《人民周刊》等；在桂林出版的有《野草》、《文艺生活》等；在贵阳出版的有《文讯》等。留在上海孤岛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一批爱国文化人也先后创办了《文献月刊》、《文艺》、《鲁迅风》、《文艺新潮》、《学习》、《上海周报》、《大陆》月刊、《知识与生活》等进步刊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物质条件很差，但也办了不少期刊。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后改组为《解放日报》），先后又创办了《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文化》、《文艺突击》、《谷雨》等杂志。这些刊物对宣传鼓舞群众，团结人民，坚持抗日救国，反对投降、倒退、分裂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等一系列法规，规定书刊原稿必须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检查通过，才能发排，借以禁锢言论，使新闻出版界深受其害。后来重庆杂志界发起“拒检运动”，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文化出版界纷起响应，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终于宣布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起撤销检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又成为中国期刊的主要编辑出版中心。在重庆等地出版的杂志如《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国讯》、《中华论坛》等等，也先后复员到上海继续编行。这时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高涨，在上海出版的《消息》、《周报》、《民主》、《文萃》、《国讯》、《时代》、《世界知识》、《展望》、《观察》等期刊，前赴后继，都成为当时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它们正确地分析和报道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深受人民大众欢迎，因而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 3 人竟惨遭杀害，其它刊物先后全被查封。昆明、重庆、广州、西安、北平等地，也有好些刊物先后被国民党政府封禁。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的前夕，反动当局排斥异己，禁止革命刊物出版，封禁进步期刊，创办或支持为其倒行逆施唱赞歌而为人们厌恶的杂志，容忍内容淫秽、荒诞的刊物充斥市场，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期刊出版业荒凉而恶浊的景象。

从以上的历史概述中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近现代的期刊出版业大致有这样一个规律，在各个历史变革时期，期刊纷纷出现，多数都成为宣传先进思想、唤醒人民觉悟的有效手段之一；也另有一批人凭借期刊宣传他们的政治见解、哲学观点、社会观点和文艺观点。因而，期刊往往是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阵地，例如辛亥革命以前，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与从维新退步到保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与主张复旧、保守的《学衡》，也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都以先进的、革命的思想胜利而告结束。而宣传先进思想的刊

物，尽管常常遭受种种迫害或封禁，甚至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监禁或杀害，但它们传播人民的呼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名垂史册，为中国的期刊史增添了光彩。

## 中国期刊业的青春时代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是从艰苦创业开始的。然而在新的土壤中，它不久就显露生机和活力，出现可喜的初步繁荣。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九五三年三月，全国期刊总数不超过 229 种，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也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时的期刊出版工作者于短时期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入城以后，面对这一景象，立刻开始艰苦的创业工作。在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新的刊物先后问世，如《学习》、《新华月报》、《新中国妇女》、《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都创办于一九四九年；一批被国民党政府封禁的期刊得到恢复，如《世界知识》、《展望》等，《观察》复刊时更名为《新观察》；一批为人民较为需要的私营专业刊物，在经登记后也准予继续出版。同时通过期刊登记等措施，对内容反动、淫秽、荒诞的刊物则坚决予以取缔。

上述一九五三年三月的 200 多种期刊，就是这样从创新和汰旧中积聚起来的，新中国成立才数月，可说来之不易。它们在宣传、教育、团结群众，以及在传播知识和信息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从中国这

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看，才 200 多种期刊毕竟太少，而且品种很不全，结构欠合理，不但自然科学技术类的刊物较少，不少学科没有期刊，甚至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也没有专业期刊，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通俗期刊严重短缺，而某些品种的期刊又多重复。期刊的编辑出版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分布很不平衡。不少期刊社没有健全的编辑部，私营期刊有的仍然粗制滥造，有的内容格调不高，甚至庸俗、低级。

针对以上这些情况，期刊出版事业迫切需要整顿、调整，同时要在全国各地创办更多的期刊，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丰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置了图书期刊司，对这项工作具体领导。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各种期刊根据自己的性质和读者对象，逐步做到专业分工，消除重复现象；大量增加各种性质的通俗期刊，以配合识字教育与文化、政治、技术教育；在多民族地区，注意出版各民族语文期刊；要求期刊社健全编辑机构，等等。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把期刊出版工作提到很重要的位置，要求有关机关也应重视期刊出版事业，它指出：“出版期刊是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应予重视。现在出版的多数期刊没有计划、没有领导，没有比较健全的编辑部，因而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徒然浪费人力物力。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将现有期刊逐渐调整，并改善他们的编辑状况。与这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把出版期刊当作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

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政务院又颁布了《期刊登记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期刊管理法规。

这样，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出版总署（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该署结束）文化部与有关单位又陆续创办了一批中央级期刊，各地也创办了一批期刊，同时对某些性质相同的期刊，经过自愿协商，作了分工、联合或合并，对一批私营期刊也作了调整，从而使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出现一九五六年初步繁荣的局面。一九五六年，全国期刊总数达到 484 种，比一九五五年增长 1 倍多，总印数达到 3.53 亿册，增长也达 1 倍。

如果说，统计数字还只能抽象地显示出新中国期刊出版事业的初步繁荣，那么，不妨从下述具体情况来更深入了解它的进展。

### 一、门类趋向齐全，结构渐趋合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增长较快，一九五六年达到 173 种，使过去某些领域中没有期刊的，也有了期刊，填补了一些空白。中国科学院各自然科学学部下属各研究所或它们的学会，都编辑专业学报，如《土壤学报》、《地理学报》、《动物学报》等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学报刊登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中央各部委及其所属专业出版社或有关团体也创刊了一批期刊，如《林业科学》、《电信科学》、《橡胶工业》、《有色金属》、《植物病理学报》、《畜牧兽医学报》、《农业技术》、《建筑学报》等等。上述单位或期刊社还编辑、出版了一批科学普及刊物，如《科学大众》、《大众医学》、《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无线电》、